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50 周 年 校 庆

历史学科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上海三联书店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50 周 年 校 庆

历史学科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论衡/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 10

ISBN 7-5426-1977-2

I. 史… II. 上…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661 号

史学论衡

编 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王秦伟

装帧设计/ 范峤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 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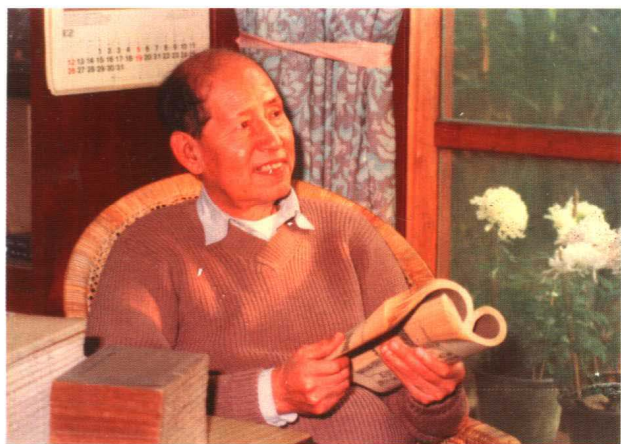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800 千字

印 张/ 28.00

ISBN7-5426-1977-2

K · 97 定价: 190.00 元



◀ 程应镠教授 (1916-1994)
1954-1957 年任系主任

魏建猷教授 (1909-1988) 1957-1984 年
任系主任 ▶



▲ 吴成平教授 (1928-2002)
1984-1992 年任系主任

叶书宗教授 (1936-)
1992-1996 年任系主任 ▶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系50周年留影(1954-2004)



第一排左起为 刘克明、孙仲发、朱永康、李培栋、季平子、顾学杰、蒋志先、叶书宗、
江爱沪、冯元魁、程翌康、陈泉娣、胡世芸

第二排左起为 王建新、周 明、袁兰女、裔昭印、王铁之、张帼瑾、孙国群、韦少波、
杨炳玉、王廷洽、尹玲玲、舒运国

第三排左起为 赵宗颇、王铎全、萧功秦、马友协、唐力行、严耀中、邵 雍、李稚勇、
郝春文、曾维华、范 荧

第四排左起为 庄韵勤、周育民、郭新嗣、陈有鏊、邢丙彦、叶 江、吴忠锐、吴强华、
虞云国、黄纯艳、张兴成、丁光勋、苏智良、徐 秋、陈 恒、周春生

半个世纪的脚步 (代序言)

从1954年成立至今,上海师范大学已走过50年的历程;同样,上海师大历史学科也经受了半个世纪的风雨。50年的沧桑岁月,18000多个日日夜夜,见证了三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与丰硕成果。

历史系的第一代史学工作者是解放初期聚集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程应镠教授和魏建猷教授,他们是历史系开创时期的巍巍双塔。此外,还有在宋史研究领域屡获成果的张家驹教授,雷海宗先生高足、近代外交史专家季平子教授,风度翩翩的欧洲史专家陶樾教授,兼通文史、尤擅词章的江辛眉先生等。他们的出现与聚合,使当年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开始成为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史学力量。特别是程应镠教授主持历史系时的古代史研究和首创古籍整理研究所、魏建猷教授的会党史研究及继程先生之后主持历史系的学术发展,他们卓越的工作,为我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和学术特色,是我校历史学科可以自立于全国史界之林的重要根基。

吴成平、叶书宗、李培栋、朱瑞熙、王铎全、郭豫明、郭绪印,还有长期在历史系工作过的王春瑜等教授,是我校第二代历史学工作者的领衔人。当时正值“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在老一代史学家的带领下,他们除了继续在宋史和会党史领域耕耘以外,还有力地推进了苏联史、历史教学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使历史学科的整体实力上了一个台阶。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学位制度的恢复,历史系很快拥有了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硕士点。

历史学科第三代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唐力行、严耀中、舒运国、萧功秦、周育民、邵雍、戴建国、虞云国、裔昭印、汤勤福、周春生、刘昶、郝春文等教授。在区域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史、非洲史、近代变革史、帮会史、下层民众研究等方面,屡有佳作问世,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师大历史学科的学术地位。世纪之交以来,历史系先后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世界史博士点和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等,硕士点则增加到了7个;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成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02—2006),以王廷洽教授为馆长的博物馆成为上海师范大学的文化窗口;历史系的同仁还积极参与创建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基地)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时光如梭,自1985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到本校历史系工作,已有20个年头,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借此机会,略叙一二。

上海师大历史学科是一个有着深厚学术积淀的专业团队。除了宋史研究为行业翘楚之外,她的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下层社会史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也在全国独领风骚。老一辈学者传承下来的不仅有学术成果,还有学术梯队,以及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崇尚实证、崇尚开拓的学术传统。正是凭借这种深厚的学术积淀,我们才能在迈入21世纪时,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上海师范大学并不排外,善于交流,善于接纳人才,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和协作性很强的学术团体。就像上海这个城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历史学科的这个特点尤其明显。例如萧

功秦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舒运国教授来自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唐力行教授来自苏州大学,郝春文教授则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尤为可贵的是,本校培养的梯队和外校引进的人才能够推诚相见,和衷共济,形成相互切磋、允公允能的良好风尚。以我自己的经历,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是当时的系领导吴成平教授、叶书宗教授接纳和培养了我,才有我的今天;是全系同人的勇于任事、同心同德,特别是几位学科带头人和系副主任范荧老师的任劳任怨的努力,才有历史系的今天。这种良好的风尚,正是我们要秉而承之、发扬光大的。

本集所收录的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工作(或工作过)的教授的代表作,其中有后来调往其他单位的王春瑜教授、朱孝远教授、许纪霖教授等。需要说明的是,因限于财力与篇幅,系里其他同人的成果未能一一登刊。结集之目的,除了纪念已走过的50年学术征程,也以此树一标杆,成败得失,自检自励。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地怀念已离我们而去的程应镠教授、魏建猷教授、张家驹教授、吴成平教授、陶樾教授、徐孝通教授、王育民教授、郭豫明教授等一大批前辈,他们的高风亮节、求实作风,和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永远值得后来者景仰与纪念。

俱往矣。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应在新的起点努力奋进。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重任,将历史地落到青年才俊们的肩上。旭日东升,其道大光,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永远在民族文化的智慧长河中,扬帆远航。

是所至祷。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 苏智良

2004年8月13日

目 录

序 言	苏智良 (1)
历史的真实与通变	程应镠 (1)
论荀子的国家观	王廷洽 (8)
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徐光烈 (18)
论胡床及其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曾维华 (24)
三国人口探索	王育民 (33)
六朝国策异同论	李培栋 (44)
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	严耀中 (50)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	郝春文 (64)
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	戴建国 (76)
赵匡胤论	张家驹 (91)
论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	朱瑞熙 (106)
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	金 圆 (119)
宋代蕃官制度考述	顾吉辰 (131)
太虚非气:张载“太虚”与“气”之关系新说	汤勤福 (140)
宋代史料真实性刍议	裴汝诚 (148)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	许沛藻 (159)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家庭、社区、大众心态的变迁	
——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唐力行 (169)
顾炎武北上抗清考辨	王春瑜 (182)
论清朝养廉银制度	冯元魁 (194)
关于施琅的再评价	王铎全 (203)
租界的起源和上海公共租界的形成	季平子 (211)
捻军斗争性质问题的探讨	郭豫明 (226)
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	
——立宪运动百年的反思	萧功秦 (243)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展	魏建猷 (251)
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	周育民 (259)
吴禄贞史事考订	赵宗颇 (271)
重评抗日时期陈独秀的政见	郭绪印 (277)
华北的村庄与国家(1900—1949)	刘 昶 (286)
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	苏智良 (297)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与朝鲜的关系

——以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为中心 邵 雍 (309)

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马洪林 (314)

史坛南北二陈论 虞云国 (323)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 (338)

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 裔昭印 (348)

“取譬”与“是”

——从判断系动词看中西方文化哲学的生成和框架 周春生 (362)

阿拉伯人与东非奴隶贸易 舒运国 (372)

海尔高特的基督教公有社会 朱孝远 (380)

论甘地和甘地主义 吴成平 (391)

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均势 陶 樾 (399)

苏共自行解散与党内民族矛盾 叶书宗 (411)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 叶 江 (420)

美、英、日高中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

——兼论历史教科书的世界发展趋势 李稚勇 (431)

历史的真实与通变

程应镠

我在中学读书时,从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对历史课很喜欢。老师讲戊戌政变,讲中法战争,讲甲午战争,讲得流泪,我们听得流泪。那时高中分文理科,我读理科,但毕业以后,我却进了历史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世界古代史十分有兴趣。罗马进兵埃及,为什么几个英雄,都迷恋于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为什么建立得像风一样的快捷,又灭亡得像风一样的迅速。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著名的学者说自己有“考据癖”,我觉得很有兴趣,以为考据成癖,也有点近乎痴了。我们当时所受的史学方面的训练,考证、校勘占的分量颇重。有的时候,我也有点兴趣,当自己以为能辨明一些史事的真伪,确知某一学派的源流,是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当时人们写文章,不是这个考,就是那个考,还有什么小考、考略……无考不成文章,考证风靡一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考证渐渐反感起来,对于有关这类文章,后来看也不屑一看了。在史学方法这一课上,我写了一篇学期论文,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写了一个 paper,主张写一部通史,不用一句引文,使人人可读,读得有兴趣。当时,我断定搞考据的人,左引某某曰,右据某某云,是写不出这样的通史来的。我很佩服张荫麟先生,他在 30 年代初^①就写了一些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的历史名篇。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写这些文章之前,对历史问题做过非常艰苦的考证工作,文章中也利用了旁人不少考据的成果。

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这是后来才真正知道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两次去过前线。我知道有些战役是打了胜仗的,有一些却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1941 年的中条山战役,我住在洛阳第一战区的最高指挥部宿舍里,彻夜听到牛铃的声音。望不到边的牛车,两辆三辆一排,把战区的物资、用具撤退至豫西洛宁。中条山 30 万驻军,一夜之间,完全溃退。但当时河南的报纸上,还是宣传胜利,说是捷报频传,或歼敌若干。1945 年 11 月 25 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晚上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国民党的军警蓄意破坏这个座谈会,时时放枪,意图骚扰。第二天昆明的《中央日报》却说是“西郊白泥坡匪警”。写历史,是要利用这些报纸的。但是,这些报纸,不经考证,就真伪莫辨了。十年动乱,“四人帮”不知说了多少假话,制造了多少假案。谁都知道这要认真查证以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首先就是强调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学历史是要有点“考据癖”,30 岁以后我是完全相信的了。只有于史不谬,我们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古为今用。

历史研究,无论宏观微观,都应当是具体的。自以为有了好的理论,就无视具体的史实,妄发议论,随意地解释历史,那就无所谓“宏观”,而是什么也看不到;同样,自以为掌握了许多史料,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也看不到历史的真实。这样,还有什么历史认识可言呢?

司马迁作《史记》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我的理解,他这里所说的“天”,就是历史;天人之际,就是各种历史因素的因缘际会。一部《史记》,130 卷,其中列

① 指 20 世纪 30 年代,下同。——作者注

传、世家、本纪占了112卷,绝大部分是人物传记。但这些人物的都不是孤立的,人与人,人与事,总是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个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就活现了,具体了。所谓“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强调历史变化的因果关系。古今有关系,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尧典》第一句“曰若稽古”,就是一个证明。孔子也懂得这一点,赞美周的“郁郁乎文哉”,是“监于二代”而来的。司马迁说“通”,更是要对历史的绵延变化,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和把握。惟其如此,对于“成一家之言”,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诸如道家、法家、儒家那样的一家之言。《史记》是一部纵贯几千年的通史,司马迁就是想通过对历史的完整叙述,来表达他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所以,他的“一家之言”,更多的是在他对历史的尽可能完整的叙述中。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把握局部,才能看见具体的史实。史实清楚了,才能通变,才能借鉴。

40多年前,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李剑农先生,对于北魏均田制的研究,因为偏离了对当时总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把握,以至于错误地把“计口授田”和均田制混为一谈。其实,北魏的“计口授田”,是在京畿(平城)之内施行的,对象是被征服迁徙于畿内的“新民”。而太和九年的均田令的施行地区,是畿内以外那些从4世纪以来坞壁主力量就很雄厚的地区,对象是坞壁主、中小地主、自耕户和清查出来的荫户。这个问题,不去把握4世纪初5世纪末中国北方的坞壁,并由此理解当日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就会机械地根据魏晋以来的田制关系,或拓跋部原来氏族社会的遗风,对它作出错误的解释。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人都难免出错。可怕的是如果人云亦云,就会连带出一系列的错误。如有些同志就根据李剑农先生对“计口授田”的解释,再根据太和十一年韩麒麟请求“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这一条史料,而怀疑均田制的实行不在太和九年,有的同志甚至还怀疑均田制中授田的规定竟是一纸空文。实际上,韩麒麟的请求,是在京师大饥、游食者甚众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与均田令无关。在均田令的条文中,也并没有“计口授田”之文。

在历史研究中,因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大格局的困难,研究者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史料导入歧途,从而使具体的史实得不到澄清。但是,这样的表述,显然还存在着某种不足。首先,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史料,具体的史实是通过相关的史料,才能触摸得到的。那么此时此刻,何以避免误入歧途呢?我以为,在这一个问题上,《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李焘对此讲得很具体:“先使其寮采摭异同,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300年,范祖禹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600卷删为80卷(实际为81卷)是也。”(《通考》卷193《经籍考》)相传,《通鉴》修成后,洛阳有两间屋子的残稿,大约都是长编的底本。其所用书,除正史外,所采杂史多至220种,或谓322种。

“宁失于繁,毋失于简”,这是指搜集史料作资料长编而言,目的在于避免有用的史料遗漏。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决定史料的取舍。做这一步工作,司马光用力甚勤,“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30卷。”撇开历史的、阶级的和思想的种种局限不谈,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故其对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很有说明力的,做到了既具体又抽象。

其记赤壁之战,不过2300字。文字是因袭旧史的:9处用陈寿《三国志》,6处用裴注引《江表传》,1处用裴注引《山阳公载记》,改易了的不过数字,写来却娓娓动人,1700余年前的事,仿佛历历在目。孙权的矛盾心情:想战,害怕战不胜;屈服,又怕失去地盘;文中虽不着一字,这种矛盾复杂心情,却回荡于行间。鲁肃、周瑜、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对曹操力量的估计是文中的主要部分,层层深入,具有无比的说服力。刘备被曹操逼到了江边,但他还摸不透孙权到底作何打算。诸葛亮见孙权,目的便在摸这个底。诸葛亮是十分机智的,他不仅摸到了这

个底,还进一步促成了孙刘的联盟。文中却没有一个字说诸葛亮是机智的。周瑜的确有大将风度,既整亦奇,但这只是通过两件小事——拒绝刘备同去看望鲁肃和接受黄盖的火攻建议——来表现的。

这些远不仅是个文字表达问题,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这一战争正确的认识。赤壁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争。战前,曹操有可能统一南方,但江东和西蜀在汉末所遭受的破坏较小,豪强力量也不如北方那样受到了农民战争的严重打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割据的可能也是很大的。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决定的因素便是人谋。其中主要问题,即孙刘如何联合抵抗曹操。在这联合当中,孙权的态度又为关键。司马光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深刻,因此便着重写孙权。鲁肃为孙权陈利害,结论是:他迎降,还可以“累官故不失州郡”,而孙权则是“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周瑜为孙权分析形势,日之不足,继之以夜,结论是:曹操“众数虽多,甚未足畏”。诸葛亮见孙权,孙权为亮所动,但还是顾虑到刘备新败,没有抗击曹操的实力。鲁肃、周瑜、诸葛亮的性格、议论,都围绕着孙权展开。这段历史便因此写得具体生动,把我们带到一个辽远的古代,与古人同呼吸共议论。记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文字也并不在多数,而在于正确理解这事件,具体而抽象,微观而宏观。

先网罗史料,通过分析综合,芟繁去芜,才能使历史的真相凸显出来。一味地堆砌史料,却不注意发现史料与史料之间所存在的问题,是无法看到具体的史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如隐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其实,这只是隐士的一种。对隐士,范蔚宗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同样是隐士,性质却大不一样。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就要看到这种不同,并从这不同之间,揭示各种不同的历史问题。北宋有个大隐士,名叫林逋,此人并非无意功名,他的侄儿登了进士甲科,惊喜之余,他赋诗曰:“闻喜宴游秋色雅,慈恩题记墨行清。”他的《送范希文寺丞》诗,赞美范仲淹“马卿才大常能赋,极福官卑数上书”,也表明了他自己于世事的热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却受到了朝廷的鼓励和士林的景仰,生前有皇帝的粟帛之赐,死后有皇帝的褒赠;像范仲淹这样十分执着于用世,得志之日,就尽其心力于救弊除害的人物,也对他推崇备至。这是什么原因呢?盖其时,读书人一中科第,便可做官,享受俸禄和一些特权;而且贡士的数目日益增加,录取的名额日益扩大,积成冗官。冗官是北宋的一个沉重负担,而当日士大夫贪恋官位,更是雪上加霜。一个叫王彦超的人,69岁了,才想到70岁要致仕。而一个叫吴虔裕的人,听说王彦超请求致仕,说“纵僵仆殿阶下”,也不学王彦超70就告老。甚至有的官员80岁了,也不提出辞呈。由此看来,林逋恬淡而为隐士,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难怪即使像范仲淹这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对林逋,不仅说“风俗因君厚”,还赞美他:“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一个原本并不重要的人物,却因从他身上折射出重大的历史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了。这样的问题,就史料而史料,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具体的史实,真实的历史问题,往往只存在于史料与史料的相互联系中。

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把握历史事件的完整性。这是极为困难的。许多历史事件,前后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些看来是偶发的历史事件,有的只是骤发于一夜之间,但真一着手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事件,前前后后也都联系着许多问题。历史研究,就是要探究历史事件的这种联系,一旦割断了这种联系,对于这些历史,我们就不得其解。中国古代的史学,对于探究历史的因果关系,把握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是十分注重的。就史学著作的体例而言,最早的是编年史。如《春秋》、《左传》,嗣后又有《汉纪》、《后汉纪》。到司马光作《通

鉴》,我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就臻于完善了。其后《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踵《通鉴》而作的。编年体史书的好处,主要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变化的时间过程,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这种过程,提供了其他的历史参照。具体而言,研究中国历史,最好是先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年纪事是非常精审的,为了避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因编年而在局部上显得比较支离割裂,又往往采取追叙和附叙的方法,这就使有心的读者,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具体史实的把握上,都能获得一种历史的通感。

自司马迁作《史记》,我国史书始有纪传体。纪传体史书重人物,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历史活动,归根到底,就是人的活动。通过对特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叙述,展现历史运动的各个方面,也有助于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具体的人物与事件。除纪传外,纪传体史书还另有书志,实际上是讲典章制度的。读史必须读志。只有通过典章制度及其历史沿革的了解,研究者才能对散见于各类书籍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加以辨别和运用。与编年体史书相比,纪传体史书的优点,就在于其处理史料的办法比较集中,比较概括;其叙述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比较完整。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书志外,还配有年表,但其编年远不如编年史详细。本纪也是编年的,所纪也过于简略。特别是年表,非深识史者,绝难加以利用。这些不能不说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缺点,而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于纪事也极简陋。《春秋》第一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仍惠公、仲子之赙。九月,及宋人盟于宋。冬,十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皆此类也。《左氏春秋》是先秦编年体史书中最杰出者,刘知幾说它“言之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载言》)。又说“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徵近代则循环可覆”。东汉末,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命荀悦删为《汉纪》,以年系事,以事为枢机,继者甚多,至司马光作《通鉴》而始大成。

清人钱大昕,跋柯维祺《宋史新编》,对《通鉴》极口称赞,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同异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潜研堂文集》卷28)此说极是。盖治中国古代史者,如果说有什么捷径,那就是首先以《资治通鉴》和十七史对读,相互比较、揣摩。通过找《通鉴》史源,就能在查书过程中,初通版本目录之学;在有关史料的比勘时,校讎之法也得以略涉门径,在史料比较与溯源的同时,既可以观摩司马光与胡三省在史料运用与考辨上的精当,若偶有讹误之处的发现,又可以引导我们粗知考证的门道;至于《通鉴》正文与胡注所涉及的五代以前的典章制度、事件人物,则更是治中国古代史者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我国古代史家,深知治史之难,写史颇重体例,必欲通博,编年、纪传于此虽各有所长,却也有兼而得者。其荦荦大端者,《史记》、《通鉴》是也。今日治中国史者,五代以前,或能将《通鉴》与正史对读,参照比较,适足以博而反约,取为通裁。自宋以下,文献既多,个人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来不及利用。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如不先从几部纪传体正史和几部编得较好的编年体史书着手,更是无所适从。古人用心良苦,令人不可不察。

编年、纪传体史书之外,我国古代史家,还创为纪事本末体。南宋袁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通鉴》所载1300余年事,约为239件。章学诚说此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此类史裁,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但就其本身而言,其叙事方式是孤立的,便于初学者观览,却难以会通。

自司马迁创为通史,及班固即截为断代。到唐朝中期,杜佑作《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天宝末年,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系载,

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于是,通史体裁渐又复萌,然其仅限于典章制度。司马光作《通鉴》,虽为编年,其实甚契合太史公作通史之旨趣。其后南宋郑樵作《通志》,标会通之义,章学诚极称之,“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乃实无殊于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文史通义》卷4《释通》)其《申郑》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史义贵会通,渔仲具司马迁、司马光诸人之卓识,但《通志》一书,除二十略之外,价值亦渺。司马光之后,如《史记》、《通鉴》之通史著作,概无可述。而如杜佑《通典》之类主于会通之典章体史书,亦局促于断代。马端临仿《通典》作《文献通考》,详于当代,亦钜制也,但章学诚仍讥为无别识、无通裁。研究历史,寻本溯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某一专题,某一断代,都必须上下左右地看。这是很困难的,但也是史学家应当刻意追求的。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通变,变是历史运动的一种特性。尽管一种社会形态、一种制度,可以绵延几百年而不变,甚至上千年,但其内部的变动还是很大的。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但是,在这一系统内部,一个宰相制度,从秦汉到明清,就不知有过多少变;田制、赋税、货币也是如此。不去研究这些变动,就无法对这种系统何以“超稳定”,做出历史的说明。

在历史研究中,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必须贯彻“通史”的观点。历史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孤立的,眼界越远越好,越宽越好。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尽管,要作这样的研究,对任何一个治史者来说,都是极困难的,但一个治史者如果根本没有这种意识,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的精神。

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们总是设法抓住那些联系面较广的问题着手研究,以使他们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展。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是从当时的劳动者身份、坞壁组织和民族关系这三个方面着手的。我以为,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当时历史的各个方面。研究劳动者身份,目的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时期的劳动和剥削方式。“新民”、“吏”、“幹”、“州郡户”都联系着当时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能一讲均田制,就只看到“编户齐民”,打混账。同样,研究坞壁,目的也就是要弄清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以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的复杂性。拓跋族的汉化和均田制与坞壁的关系怎样?重要不重要?这些,我都是从对坞壁的研究之展开中,才逐渐认识到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也是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关键。坞壁、汉化、胡化、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都与之关系重大。很可惜的是,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展开,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就爆发了。1957年的“反右”,本已使我的研究陷入困境,而我的几乎所有积稿和相当一部分资料卡片,又在“文革”中被毁或遗失,等到“文革”结束,种种原因使我再也无力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呜呼!难以尽言矣!

历史研究要做到比较全面,就要抓住那些能够联系各个方面的核心问题。有些问题,看上去微不足道,其实牵涉面甚广。马克思写《资本论》,捉牢一个商品,从中引出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像劳动和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要捉住历史的主要问题,就要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用理论去发现问题。占有的史料越全面,理论水平越高,发现的问题也就越有质量。我是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不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绝对正确的理论,而不是努力从伟大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努力去研究理论的展开过程。用这样的

态度去学习理论,任何理论都是没有用处的。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历史原因,这里就不说了。

学习理论是一个更艰苦的过程,而且要用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历史研究,其前提就是研究必须首先开始。理论的作用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不应该从理论出发。所以,治史者要想发现历史的问题,还须注意方法。最重要的是比较的方法。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以为周人制度大异于殷者有三:第一是立子立嫡之制,第二是庙数之制,第三为同姓不婚之制。这都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有比较才能区分问题的性质和主次,有比较才能启发理论思考。历史不会是陈陈相因古今如一的。汉承秦制,却不是一个模子铸成的。倘采取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则秦汉之差异自见,而所谓同,也大有可说了。汉唐俱称全盛,差异也很不小。即以唐一代言之,天宝之前及其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便迥乎不同。唐宋差异很大,土地私有,租佃制的确立,两宋在我国历史中是别具特色的。在古代,自然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很大,山地和川原,经济文化俱不同,以成都府路而言,山区和平原差别也很大。研究历史,不独有时间上的比较,还要有地区上的比较。中外历史也要通过比较,才能互见。一概而论,就要迷失历史的真相。

历史是复杂的,但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却被大大地简单化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我们的头脑被简单化了。头脑的简单化,原因是我们把理论简单化了。理论一简单化,一切又都是从理论出发,历史自然要被简单化。

理论又是怎样被简单化的呢?认为理论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了。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只重结论,而对其理论体系的展开和论证过程失去了兴趣。一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一讲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反映到具体研究中,则更进一步简化为阶级斗争,生搬硬套,把中国历史说成是农民战争史;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压迫,逼得农民起来反抗,推翻一个王朝;新王朝建立,休养生息,对农民让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又是残酷剥削压迫,又是起义,又是王朝覆灭……如此这般。

实际上,农民战争在我国历史中,并不如此简单。秦汉隋唐,陈胜、吴广,赤眉、铜马,黄巾、黄巢都是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开始的。东晋南朝,农民的反抗,或三吴、或四川,也是生产发达的地区。北魏之末,六镇起义,却在极边。宋元明清,情况又极不同。李自成起于陕北,洪秀全、杨秀清起于广西。那时,陕北和广西都是落后地区。就这些农民战争开始的地方不同,也可以说明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那么简单、划一的。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恐怕也不那么简单,就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在封建社会,是否也是促进生产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十分重视安定与团结,显然,也是目前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

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理论也应该是发展的、变化的。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知今,现实总是在对人们提出新的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必须不断更新。所以我们不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学习各种新的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都不应该有禁区,否则就无所谓学习和发展。决不能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再学习其他各种理论了。曾几何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与我们对西方的各种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社会学的理论所知甚少有关。理论上的贫乏,造成了理论研究的困难,以至于热衷于对理论作简单化的理解,这实际上是不要理论或轻视理论,而只重个别结论。用结论去研究历史,当然只好“以论带史”了。所以,一些即使是很明显的错误,也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了。如历史为现实服务,明明是错误的,人们却不以为怪。历史是已然的东西,现实是正在进行着的

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会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呢?古为今用,说的是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不是百货商店,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不能一讲五种生产方式,就否定各国历史的特点。更为可恶的是,搞什么“儒法斗争”,史学成了某种政治阴谋的工具,我国历史上,除了陈胜、吴广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就只剩下了寥寥可数的法家人物了。汉武帝、柳宗元、王安石都成了法家,汉光武帝则是“羞羞答答”的法家。历史研究,就是这样失去了学术尊严,完全被当作了儿戏。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治史者必须具有尊重这门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从何而来呢?我以为,一个对真理的精神没有透彻了解的人,是不可能坚持真理的。真理的精神存在于对真理的追求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列宁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列宁:《卡尔·马克思》)说到继承与完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始终是把它与自己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缜密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总是把自己的思考,集中于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对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思考,一方面是从对各种理论的体系上去把握;另一方面是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中去理解。这就是历史科学的研究精神,也就是追寻真理的精神。丧失了这种研究精神,不会有历史科学,更无所谓治史者的良心。

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20世纪的发展变化尤其之大,新的理论新的思潮也随之出现,由此对历史提出了新的问题。教条主义者不是看不到这种变化,就是苛求前人没有预见到这种变化。我们的历史研究如果也采取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将失去它的现实性和力量,也就谈不到认识历史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了。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不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研究精神,认真地研究这些新的理论和思潮,并从历史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去获得理解,对历史提出新的问题。由此,历史科学才能发展,我们的历史认识才能提高。

(原载《流金集》学术编)

论荀子的国家观

王廷洽

先秦文献保存了丰富的国家理论。那些国家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比较接近于国家形成的时代,尤其是《尚书》、《周礼》、《诗经》、《逸周书》等早期编订的文献,就更反映了国家初现时期的观念,是一份丰富而珍贵的思想遗产。我们今天认真地进行研究、讨论和总结这份遗产,对于认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是战国最后一位思想家,亲眼目睹了我国上古时期众多邦国的逐步兼并,和“天下将归于一”^①的形势,因此,社会在进化,国家在进步,是荀子国家理论最为明显的特点。在这一前提下,荀子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机器的构成,富国、强国的政策,“调一天下”、“齐一天下”的大一统学说。除了《吕氏春秋》以外,《荀子》保存的国家学说是最为丰富的。

—

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孔子曾说:“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②言下之意,拥有一定的国土、设有祭祀的场所、能和诸侯订立同盟等,就是国家了。墨家认为:“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③意即国家的职能是保护民众的安全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国家形成的原因。荀子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注意到了“寡则必争”和“群而分”两大内容。

荀子看到了国家机器是在调和人们因私欲而造成的纷争,以及由强弱、知愚、老少等因素而形成的不公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荀子·富国》曰: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执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究,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则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有知者为之分也。

文中“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似乎可与以地区划分居民的国家观念相当。“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又显然是指国家统治权力。而尤其“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语,实际上是由于社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论语·先进》。

③ 《墨子·尚同中》。